中国图书出版中心及传播方式的形成与演化

张　娟
（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北京　100835）

摘要：【目的】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图书出版中心的形成及传播方式。【方法】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中国图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基本特点和中国图书出版传播中心的形成规律，对中国图书出版传播形成的西安、北京、扬州、苏州、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中心城市进行了总结，并对其传播方式进行了分析。【结果】中国图书出版中心的形成具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在中华历史文化传承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在皇家图书收集、整理、出版、借阅，个人藏书家收藏、借阅、传抄、刻印，书院、家塾刻本与社团个人自费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图书网站及网店等历史长河中进行传播，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图书出版传播方式。【结论】以上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图书传播的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出版的传播，发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关键词：中国图书；出版中心；传播方式；历史；收藏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2-142-05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2.029
本文著录格式：张娟．中国图书出版中心及传播方式 [J]. 中国传媒科技，2023（02）：142-146.

导语

中国图书在中国文化思想传播中占据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对中国文明智慧的传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图书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具有可见性、稳定性、工艺性，所以成为中国知识传承的主要渠道。[1-2] 中国图书以 1905 年取消科举制、设立新式学堂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古今两个阶段，古代以竖排线装书为主，今日以横排平装书为主，本文所谓图书以此为准讨论。[3] 中国图书出版传播中心的形成和传播方式的建立至今还没有被大多数人了解、关注。[4-5] 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便出版行业借鉴。

1. 中国图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基本特点

1.1　圣王时代的“河图洛书”和官方成书

《易经》记载伏羲画八卦，有神龟背负河图洛书等既有历史可信成分又有神话传奇色彩，将中国最早文字符号和图书的产生归于人文始祖伏羲的发明和神物昭示，实际上是天人合一观念和精英崇拜的反映。今日甘肃天水还有古老的伏羲庙，据说伏羲是发源于三江源、中国西北的太昊氏部落的酋长，被称为父系氏族社会开基的圣王。从商代甲骨文文字符号和甲骨文记载的主要内容看，都是部落酋长、帝王出行、狩猎、战争、人事、年成、迁徙、占卜为多，最初为巫师所记，刻写在山石、甲骨、陶木上。西周时设左右史即内外史，记载帝王实录，以后直到清末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习惯。所以，中国最初的巫、师、史是中国最早的知识精英、文字的书写者、图书的记录者及保存者，而其后续者除了他们就是帝王、酋长、官员、士绅，一般老百姓与编写出版无关。河南汤阴的羑里古城是周文王在囚禁中推演六十四卦的地方，圣王与巫师合二为一，将《易经》定型为《周易》，为中国文化哲学、图书成型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商代的《连山》、周公之后《周礼》《周书》的形成，周公主持集诗形成的《诗经》、春秋时期形成的《尚书》都是官方图书形成、出版、应用的第一个高潮，也都是圣王记录、精英著述。西周初年就出现了官方档案、图书管理、出版机构——“云台”。

1.2　以诸子百家著述、教育、思想为主的精英个人著作成书传播

对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儒家先师孔子被称为“文圣人”，他不仅成立私人学校，由学生记言成书《论语》，还以鲁国保留的春秋史传档案、官书《礼经》《易经》等五经六艺图书为主删繁就简，改编设教，承前启后地出版了以竹木简为载体的图书，到汉代基本得到传承，受到独尊，再加上持续发展的儒家代表孟子、子思、荀子、邹衍、董仲舒、叔孙通、桓宽等，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读物，与农耕文明相辅相成。法家也出现了一批从春秋到战汉的代表性著作，促进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儒法结合和多元平衡，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吕览》《盐铁论》等，包括遗失的魏文侯宰相李悝的改革著作和法令。道家《老子》《庄子》

《黄帝内经》《淮南子》及扬雄《太玄经》、太平道《太平真经》等也是道家祖师、精英个人或集体的著述。其他精英个人著述也多，如《墨子》《孙子兵法》《鬼谷子》《亢仓子》《列子》《新语》《新书》《论衡》等。

1.3 战汉时期师徒相传的官方定位传习图书

《山海经》是师徒相传保留下来的地理风俗之书，应是战国中晚期成书，到汉初才整理出版。在战国晚期的秦国，富商吕不韦以秦国财力为基础集聚人才，编著了现存第一部百科全书《吕览》。《淮南子》为淮南王主持，道士们集体写成。张安世为汉武帝管理的图书应该大多为儒家经典或前代典籍，其图书也是前后师承成果。《汉记·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记载刘向编辑出版第二套官方百科全书——《七略》，同时他研究、介绍了自孔子以来的五经教授关系。如《易经》是孔子→鲁商瞿子木→养庇子庸→王孙→江东馯臂子弓→燕人周丑子家→东武孙虞子乘→齐国田何子装→梁人丁宽→淄川杨叔元（汉武帝太中大夫）创易经杨氏学→槐里田王孙→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琊梁丘贺→梁人焦延寿→京房易学→东莱费直、沛人高相。这是典型的师徒传承学问及著作出版方式。汉宣帝时还在白虎观组织当时儒家讨论五经异同，对五经的研究、出版、教育、阅读推动作用很大。

1.4 官刻公用与家传公用并行，公私双层收藏出版图书

从西汉中期开始，汉朝成立太学，设五经博士，比如董仲舒、孔安国、桓充、刘向等。太学必有教材、著述和研习；各亲王郡国也有郡学，有的也设博士。学生主要是权贵子弟、富商豪强子弟、推荐生。其中教材为官刻公用。汉武帝时，孔安国以后代身份向朝廷贡献孔子所著书，充实官方收藏、公用、太学研习。此为家传公用。当时图书出版没有出版社，学者个人、家族、地方政府、皇家都可以出版，东汉时出现皇家校刊机构“东观”。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史著是家传史官资料。他们管理图书再出版图书，均有半公半私性质。中国图书出版、读研、传播在汉代迎来第二个高潮。

2. 中国图书出版传播中心的形成规律

2.1 政治中心即图书出版传播中心

中国的核心城市往往是政治中心，大一统的权力组织制度强化了政治中心的社会作用。[6-7] 因此，中国的政治中心比如首都或区域政治中心往往因为政治教育、宣传、组织的需要成为国家的文化中心，图书的管理、编辑、出版、阅读、讲解、应用这六大环节是非电子时代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所以政治中心往往同时就成为图书出版传播中心。如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东晋的建康（今南京），隋唐的长安，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元明清的北京及南京、扬州。明代由于洪武年立朝时首都在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保留南京地位，也设立礼部、国子监等文教机构，因此文化出版活动始终未停。元代之后由于大运河的南北开通，居中的扬州也成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为图书出版传播中心。民国时期，首都南京也是民国政治和文化出版中心。图书的出版传播必须同时具备权力组织、文化人才、物资材料、交通运输条件，政治中心恰恰首先满足这些条件，成为图书出版传播中心是必然。

2.2 经济、外交、贸易中心在开放时代成为图书出版传播中心

同时成为经济、贸易、外交中心的城市一般具备港口条件，最为典型的是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枢纽扬州和民国之后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津运系统的代表，它沟通南北水路，接连东西水路的钱塘江、富春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漳河等，对内陆津运形成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物资供应、市场发育、对外贸易至关重要，大运河明珠扬州的经济、外交、外贸地位无可取代，何况大运河还联系着其他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北京、南京、杭州。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居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长江入海口位置，具有出入海洋、内陆的交通地位，又位于中国东南苏杭富庶经济区、文化活跃区的中间位置，逐渐成为现代化中国的工业生产中心、设计工艺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外贸外交（如租界使馆）中心，因而形成中国现当代南方以至全国的图书出版传播中心。

2.3 旅游文化中心成为传统的图书出版传播中心

西安、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古都，既是古都，也是中国的旅游文化中心，在旅游文化活动中文化交流必不可少，因此需要图书出版传播，并对周围城市、地区有传播辐射作用，将图书传播到相近地区，并借助旅游、教育、交通让图书传播到更远或落后地区。[8] 苏州是春秋时期吴国首都，是文化传统深厚、人才济济的旅游城市，也是鱼米之乡，教育事业相对发展充分，传统书院、私塾和现代大学（东吴大学→苏州大学）、专科学校（如苏州美专）并行不缺，高官士绅云集，给图书刻印、传播、出版、著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苏州也是大运河上的明珠城市，为图书出版、传播、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这些古都也是区

域文化中心、人才中心、教育中心，发展图书出版条件优越。

3. 中国图书出版传播形成的主要中心城市

3.1 西安

西安即汉代、隋唐的首都长安，其附近还有周代首都镐京、秦代首都咸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一直是中国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西周以镐京为都时，周公、周成王、周穆王等发布政令、记载史书、传达周礼、采集编校诗歌、谣谚都在镐京进行。西汉以后长安如同新镐京、新咸阳，除了上述政治文化活动及其成书传播成果之外，西汉还在长安设立太学讲学、著述、校刊，在宫内东西阁设官方历史教育、英烈教育展览，供权贵、嘉宾参观、讨论。孔安国校书印书、刘向校书印书如《七略》《艺文志》《严氏春秋》著述出版、《白虎通》等研讨会和图书的出版都在这里进行。汉武帝有随身查阅的活动图书馆和专门管理员张安世，版本学已经出现五经版本研究。东汉西晋时长安是西京，隋唐时又成为首都。唐太宗在宫内有专门的图书特别是碑帖收藏阅览处，唐玄宗时邺王宫内设专门藏书楼，史称“邺架”，图书已达千部以上。晚唐出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佛经《陀罗尼经》，也应该是中国印经中心长安印制并向外传播。元明清时，西安是西北出版传播中心，尤以阿文图经、碑版为特色。民国至今，西安始终拥有一批出版社、印社、文化组织进行传统木刻印行，以及现代石印、铅排、油印、胶印、彩印图书出版和传播，其影响及于全国。这几十年来，陕西人民、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太白文艺、三秦等出版社出版传播了许多富有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好书，限于篇幅不作具体介绍。

3.2 北京

北京是北方古都，元明清时是全国首都。房山琉璃河镇的燕国遗址也在附近，历史悠久。现存中国宋代古籍中也发现古幽州即北京所印图书。辽代时北京是“南京”，金代时也是首都，辽金时期的北京也有佛经、地方志、教育图书、个人文集的出版、传播。宋代图书特别是苏轼、欧阳修等人的诗文集也从开封等地传到北京，经过仿刻再传到辽金各地。元明清时北京经常举行科举殿试，教育图书、科考图书、史书、别集不断出版，再由水路、陆路传到全国。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的编辑、校对、出版、赠阅、选编等带动了北京的图书出版传播活动，同时使北京成为全国皇家图书收藏、出版、传播中心。民国时北平以大学、图书馆和家藏书著述为中心，出版了许多学者著作、机构文献、传统古籍、书画刊物。1949 年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新老出版社众多，每年出版大量政治、文艺、艺术、教育、科技、工艺、经济、军事等著作，在此不一一详述。如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名著译介系列丛书、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小说、三联书店的学术著作。

3.3 扬州

元明清时代，扬州是我国东南部的图书出版和传播中心。今日扬州还有专印古籍的广陵书社，有扬州大学出版社。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南京著名藏书家、读书家薛冰（笔名止水）在《姑苏书缘》中提到的清代马曰琯兄弟编辑出版的《小玲珑馆丛书》，还有《扬州画舫录》《石涛画语录》都是在扬州出版发行的，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书店还曾经再版后两种。从民国到当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作家阿英、郑振铎，史学家谢国桢教授、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等都曾到扬州购书。扬州清中期以后的著名出版机构和书店有商务印书馆扬州分馆、文海楼、世界书局、会文堂、聚盛堂、文富堂、陈恒和书局等。湖南的著名诗人易君左，著名作家、出版家郁达夫均到扬州淘书，称赞扬州书店书籍“汗牛充栋”。韦明铧在齐鲁书社版《藏书家》[9] 第 2 辑中写有《扬州淘书记》，他记载有图书《海陵（泰州）竹枝词》（还有瘦西湖竹枝词、花神庙诗辑）、李涵秋小说《广陵潮》、曹寅《楝亭集》、金农《冬心先生集》、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1951 年中国盐业公司编印的盐业教材，还有扬州人、创造社成员洪为法的《为法小品集》等。同上第 4 辑韦明铧在《沧桑测海楼》中还介绍了民国的《闲话扬州》风波、吴氏测海楼贱卖藏书给北京富晋书社（杨梅竹斜街）经理王富晋的故事。这批书都钤盖了“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印章。由于主人吴引孙曾做过浙江宁绍道台，所以收有宁波天一阁藏书，如《延安府志》《八闽通志》等方志书。转卖给王富晋时还有 589 箱 8020 种，分别运到当时南北两大文化出版中心上海和北京，造成部分图书外流，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今藏《苏长公密语》。扬州吴氏测海楼 2 层，横阔六楹五间，藏书多达万部，被韦明铧誉为“扬州的天一阁”。

郑振铎《清代文集目录序》记载了扬州何氏、无锡丁氏（祖荫）家族藏书在民国流散。

3.4 苏州

苏州紧邻太湖，四周低山，溪涧农田交错其间，适合养老、交游、著述、隐居，所以成为中国权贵的“后

花园”，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后花园”，私家园林、藏书楼、书坊众多，成为令人流连的出版发行重镇。许多读书人、学者、藏书家将苏州作为藏书、读书、出书、淘书的胜地。

止水《姑苏书缘》记写了清中晚期到民国苏州潘氏一门的刻本出版盛况。“吴县潘希甫补之”《花隐庵遗稿》、潘世璜《不远复斋杂钞》、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潘奕隽三松堂数万卷遗书则更早。民国潘圣一著有《书林轶话》《苏州名胜诗辑》。

据王稼句《苏州书坊旧观》考证，中唐时期白居易到苏州任官时苏州的出版、园林都有，曾雕版印行白居易诗文；五代时苏州曾经刻印、销售经咒、历本（书）、字书、诗歌等。宋代特别是南宋时，在图书出版方面，苏州已经与临安等地浙刻、福建闽刻并称东南三大刻印中心。元代后期，从大元泰定元年（1324年）到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位于天心桥南的著名书院——刘氏梅溪书院出版、销售了许多图书。明晚期著名学者、出版家胡应麟在出版科学专著《经籍会通》时记载，苏州是全国四大书市之一（其他为北京、南京、杭州）。明代苏州有出版图书的书坊70多家，清中期还有36家，许多苏州的大藏书家同时是全国瞩目的大出版家，如汲古阁毛晋、脉望馆赵琦美、述古堂钱曾、铁琴铜剑楼瞿氏父子、士礼居黄丕烈等。

阿英在1938年写的《苏州书市》中介绍，苏州刻书的书房、售书书店大都在阊门里，如察院场、玄妙观、牛东大街、大华路、闾邱坊等，住店淘书需要一连几天，著名的书坊有文学山房（江氏）、来青阁、松石斋、存古斋、适存庐、扫叶山房、有正书局、觉民书店、振新书社、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振古斋、大成坊、汇文轩、文津书林等。传统古籍、私家珍刻、新文化图书、杂志画册应有尽有。每家均有自己的专长，比如扫叶山房专营家刻古籍和各地官办书局印行的图书。江澄波《苏州古旧书业简史》记述苏州书坊30多家，如文学山房不仅出版古籍旧书，还以木活字摆印出版《江氏聚珍版丛书》，各地文化名流经常光顾，如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涵芬楼孙毓修，北京藏书家、版本学家傅增湘、历史学家顾颉刚、上海作家及出版家阿英、郑振铎，苏州高官收藏家李根源等。

抗日战争以后苏州书业走向衰落，但仍是古旧图书传播收藏的一个重要城市，至今魅力犹存。

3.5 上海

上海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中心，而且规则变了，它代表以西化冲击东方的现代出版业的新方向，辐射全国并平民化，是传统的政治中心出版事务无法相比的，影响民族命运的能力、方式比封建时代大大增强，周围传统发达的旧文化中心如苏州、扬州、南京、杭州一经被它取代，就没有招架之力，因为它古籍、新书、黑白、彩印通吃，背靠西方技术、海洋文明，面向中国资源、文化，以新的市场和思想动力冲决一切堤坝、限制。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上的重大改变，此后上海模式影响全国至今。

传统古籍出版名坊是上海涵芬楼。孙毓修汇聚群书编成《涵芬楼读书录》。涵芬楼和商务印书馆是连襟，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横排铅印古籍和教材、学术新著、文明新著。彩图新编、动漫木刻是上海图书最鲜明的特色。如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成套《连环图画三国志》、四大名著、《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画本小说。

上海出版从民国起开启了中国的看图时代，其连环画书、月份牌画册、绣像小说、画集教材、画报杂志以各种排印方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包括与图书有关的相关行业开拓，如动漫、影视、彩印、会展、学术、教育等。由鲁迅等倡导的现代木刻版画一枝独秀，进入内地，助力新中国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木刻版画在美院成为一个大系亦与此有关。[10] 新文艺的左翼社团以鲁迅等为领军，现代派小说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言情小说，加上武侠小说，颇为壮观，成为上海新图书中受众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品类，在时代和政治思想变化中连续不断。限于角度和篇幅，本文对此不详细展开。著名版本专家黄永年在《忆世界书局的连环画》一文中还提及少时阅读过上海出版的教育杂志《儿童世界》《小学生文库》。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民国的古籍新印、画报、小说等还出现影印潮、重印本、改编本包括民国学术经典、小说丛书。

上海近代以来有多少出版机构、社团，所出版图书、杂志等数量至今无法全面统计，许多方面都是中国的第一个，如1932年中华艺学社出版的《中华摄影》，1946年实学书局出版史地新著《中国地理新讲》，1948年青铜出版社出版美国诗人惠特曼诗集，改革开放后其诗集又不断重译重印。1937年6月黎明书局出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也出版了许多新思想、新学术图书，三联书店直至今日仍是北京出版思想学术著作的中心。

4. 中国图书传播的方式

4.1 皇家图书收集、整理、出版、借阅

汉武帝在一次外出携书旅行中发现张汤之子张安世善于管理图书，就叫他负责图书管理，整理书目。张安世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图书专职管理员，司马迁和班固著作史书时所参考、借用的图书也是皇家或官方太史监专门收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编著图书也是官方用书藏书，他们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

4.2　个人藏书家收藏、借阅、传抄、刻印

汉代淮南王刘安著作《淮南子》等书并向皇帝献书都在《史记》《汉书》《汉纪》[11] 中有记载，同时说明在刘安身边如同吕不韦一样召集、聘用了许多人才编校、讨论。西汉河间献王由于静心收书、著作、献书受到皇帝表彰奖励。盛唐时邺王、中唐时相王个人藏书规模很大，身边也联系着一批有书好学之士。宋代兴起个人平民、士官藏书风，《清明上河图》中已出现书铺，南京临安陈氏书铺印行“叶子”书。明清个人藏书家更是灿若星河，在收书、发行、销售、抄传上成就很多,对中华文献典籍传承作出突出贡献。

4.3　书院、家塾刻本与社团个人自费出版发行

宋代兴起书院，聘请名师主持，有的编书、赠送、传读、转卖。如周敦颐在庐山脚下办濂溪书院、朱熹等办白鹿洞书院，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在山东办泺源书院。近现代以后社团出书成为图书传播的一大方式，如民国的政治文艺组织南社、杭州的西泠印社、上海创造社，新中国政协组织及画院图书、个人自费出书。

4.4　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

大清光绪皇帝厉行改革后，在北京由朝廷成立以译介外文图书、西学名著、报刊为主的同文书院，设在西直库胡同。上海出现申报社、点石斋、有正书局等，出版石印二十四史、时事著作、画册等，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称为出版社的专门机构多了起来，直到今日成为新中国出版传播图书的主体。

4.5　网络及新媒体平台开辟图书出版传播新时代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到20世纪末，各大出版社、书店一直是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力量。21 世纪初网络的出现及普及，使得图书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图书的传播重心转移到网络平台。

2000 年 5 月，卓越网成立，后被亚马逊收购，主营业务是图书和音像，它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随后成立的当当网专注于出版物的销售，并一度成为中国网络书店的代名词。

2004 年后，网络书店电子商务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当当网、博客网、孔夫子网等吸引出版社、新华书店、书商、书店、个人收藏图书展销，成为青年人买书读书的一个新方式。[12] 孔夫子网是旧书交易平台，在网上成交活跃。

大约在 2015 年前后，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以及几年后出现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等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今天，抖音、快手等社交软件和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进入出版物销售传播主赛道，成为中国图书传播的重要力量。

结语

文章对中国历代图书出版传播中心的形成以及传播方式的建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使人们对中国图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基本特点有了全面了解，对中国图书出版传播中心的形成规律以及传播方式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出版的传播，发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荣方超 . 中国出版学术史的编撰理念：以《中国出版史》为例 [J]. 图书馆杂志，2009（11）：93−95+10+18+30.

[2] 王元 . 人工智能与图书出版融合发展研究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1）：57−59.

[3] 何明星 . 中国的世界出版能力现状与发展契机 [J]. 出版发行研究，2018（12）：85−90+45.

[4] 胡硕磊 . DG 出版社数字出版的业务流程再造研究 [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8.

[5] 杨艳 . 数字阅读背景下图书出版的机遇与挑战 [J]. 文化产业，2022（32）：19−21.

[6] 范春青 . 大数据在图书出版流程中的应用探究 [J]. 传播与版权，2022（10）：35−37.

[7] 王砚 . 传统出版如何融入数智化阅读时代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12）：50−52.

[8] 唐棣 . 人工智能与图书出版融合发展研究 [J]. 采写编，2022（9）：133−135.

[9] 齐鲁书社 . 藏书家 [M]. 山东：齐鲁书社，2005：150−155.

[10] 许广平 . 鲁迅书简 [M]. 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85−90.

[11] 荀悦 . 汉纪 [M]. 北京：中华书局，2017：50−55.

[12] 张旭 . 融媒体出版时代图书编辑融合意识的提升策略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12）：102−104.

作者简介：张娟（1978−），北京，本科，编辑，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新媒体传播。

（责任编辑：张晓婧）